

CONG XIANGGANG GERANG DAO NUWANG FANGHUA·FUJIAN RENMIN CHUBANSHE

● 朱宗玉 杨元华 窦晖 著

从香港割让 到女王访华

—中英关系1840~1986

● 福建人民出版社

从香港割让 到女王访华

—中英关系1840~1986

■ CONG XIANGGANG GERANG DAO

NÜWANG FANGHUA

■ 朱东平 楼光华 编 谢 嘉

■ 湖南人民出版社

(闽)新登字01号

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
——中英关系1840～1986
朱宗玉 杨元华 窦晖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印张 6插页 212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2571—9570

ISBN 7-211-00994-2

D·36 定价：4.05元

序

近年来，中外关系的学术研究蓬勃兴起，一些有质量、有见地的论著如雨后春笋，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本书就是中外关系学术园地中的一株新苗。

中英关系与中外其他双边关系相比，有其独特之处。19世纪40年代，英国第一个发动侵华战争，用洋枪洋炮打破了腐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香港。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加入了敲骨吸髓的行列。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世纪后，英国随着国力相对削弱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中国的位置逐渐下降。但尽管如此，英国仍然是一个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的西方国家，同时扮演着镇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刽子手的角色。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中英曾作为“盟国”，共同抗击过法西斯，英国仍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战后也不肯放弃对香港的重新占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为中国人民平等发展同各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英国曾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西方大国，但由于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其对中国的态度十分暧昧，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了两面性政策，致使中英关系长期不能正常化。这种状态延续了22年后，英国政府才作出了明确的抉择。1972年3月，双方决定互派大使，中英关系实现正常化。但是，在两国关系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这个“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发展难以达到它应有的水平。80年代初，中英

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通过谈判，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开创了中英关系的新阶段。香港问题的解决，也为国际关系树立了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树立了榜样。

目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使我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以集中力量搞好改革和四化建设。我深信，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情况下，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合作交流的共同信念，使中英关系的发展具有牢固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回顾历史，以历史为借鉴，进一步发展中英两国关系，是中英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学习和研究中英关系史有其特殊意义。

此书的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外有关史料，比较详实地阐述了自上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香港被占，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叶，中英两国按“一国两制”方针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英最高领导人互访的历史。这近150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艰苦奋斗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变化最深刻的时期。此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巨大变迁。因而，此书既是研究中英关系的著作，又是学习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有益读物，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尽管此书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瑕不掩瑜，更何况它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比较全面论述中英关系史的书籍。因此，我还是愿意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推荐这本书。



1989. 1. 5

目 录

序

王首道

一、中央王国与“日不落”帝国：一个在衰落，一个在强盛	(1)
中英交通	两国交往历史的追溯 (1)
愚昧狂妄	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 (3)
贪婪狡诈	向外扩张的“日不落”帝国 (7)
鸦片走私	英政府支持的肮脏贸易 (12)
二、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两次鸦片战争，	
两个不平等条约	(16)
鸦片战争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6)
觊觎香港	被割让的中国领土 (21)
通商口岸	扩大侵略的据点 (26)
国中之国	被强占的租界地 (31)
三元里斗争	中国人民的愤怒 (34)
英法联军	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38)
三、磕头外交：“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46)
关税旁落	英人出掌税务司 (46)
修建铁路	布下千丝万缕的侵略网 (50)
巨额借贷	增强在华的政治地位 (54)
“借师助剿”	太平天国被镇压 (58)
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占津京 (61)

四、藏边多难：中国西部边陲受侵略	(67)
马嘉里案	侵华史上重要的一页 (67)
窥伺西藏	英军发动侵藏战争 (71)
藏战再起	《拉萨条约》的签订 (75)
西姆拉会议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79)
五、“强硬”中的软弱：半殖民地外交的继续	(85)
奔走革命	孙中山伦敦陷囹圄 (85)
武昌起义	英政府支持袁世凯 (88)
欧战爆发	东京填补伦敦的空缺 (94)
列强分赃	从巴黎和约到九国公约 (97)
弱国外交	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 (103)
六、“打倒列强”：从广州出发的革命	(108)
海员罢工	对港英的一次打击 (108)
颠覆革命	英政府支持商团军 (111)
反帝狂魔	从“五卅”到省港罢工 (116)
万县惨案	炮舰政策重演 (121)
北伐进军	汉浔英租界收回 (123)
南京惨案	炮舰再次逞凶 (127)
七、若即若离：伦敦在南京的地位下降	(132)
改订新约	主权仅部分收回 (137)
“国联”调查	姗姗来迟的结论 (137)
币制改革	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 (141)
绥靖政策	布鲁塞尔会议与“远东慕尼黑” (145)
米字旗降落	帕米尔的反英斗争 (149)
八、共同抗日：不协调的同盟	(154)
中英新约	伦敦不放弃港九主权 (154)
军事合作	有成功也有失败 (157)

协同作战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	(161)
开罗会议	蒋介石与丘吉尔的争论	(166)
抗战胜利	香港受降权属谁	(170)
九龙事件	火烧广州英领馆	(174)
九、不愿退出中国大陆：最早承认共和国的西方大国		(178)
雄师过江	“紫石英”号逃窜出长江	(178)
红旗升起	唐宁街决定“承认”	(183)
特权取消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189)
军事围堵	不光彩的追随	(192)
十、半外交状态：代办是最离外交官		(199)
商谈建交	外长会谈日内瓦	(199)
发展贸易	“禁运”篱笆上的缺口	(202)
骑墙逻辑	两面性的对华政策	(207)
充当桥梁	斡旋中美关系	(212)
十一、正式建交：开拓合作新领域		(216)
蹒跚前行	朝向关系正常化	(216)
“只有一个中国”	大使赴任递国书	(219)
平等互利	双边合作呈新貌	(224)
十二、历史新篇章：中英再建丝绸之路		(228)
互相“亮牌”	撒切尔夫人访北京	(228)
“一国两制”	解决香港问题辟新径	(233)
排除障碍	二十二轮谈判见成效	(237)
协议签署	香港归属已定	(242)
夙愿实现	女王漫步紫禁城	(247)
结束语		(253)
附录一 中英关系大事年表		(256)
附录二 中英两国主要条约、协议、联合声明		(264)

中英南京条约	(264)
中英北京条约（节录）	(266)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268)
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节录）	(2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	(2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27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	(275)
附录三 参考书目	(278)
后记	(280)

一、中央王国与“日不落”帝国： 一个在衰落，一个在强盛

中英交通 两国交往历史的追溯

据有关史料记载，中英两国之间的交往开始于13世纪。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欧亚两大洲之间陆上交通畅通，海上交通也发展起来。中国的元朝政府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有了联系和接触，罗马教廷曾多次遣使元朝，元朝亦遣使通好罗马教廷。公元1289年，元朝廷在通使罗马教廷的同时，还致书英王爱德华第一和法王菲力。这是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交往。从此，中英两国人员往来不断。

公元1290年，维吾尔族人玛巴琐马曾到罗马和英法等国游历，在伦敦时曾谒见过英国王公贵族。1307年7月，元朝伊儿汗国合尔班答派遣使臣到英国，当年12月，英王爱德华第二就向合尔班答回复书信。当时有不少欧洲人在元朝廷及其军队中任职。一位名叫巴西尔的英国人，懂得多国语言，曾在蒙古军队里任翻译。据传元朝西侵时，第一次派往匈牙利的使臣就是英国人。这些都说明，早在700年前，中英之间就有着交往。

16世纪以后，英国曾多次希望沟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1596年，英国一家公司的代表多德雷率领三艘船只，携带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致明朝万历皇帝的一份要求通商的国书，前来中国，但估计这三艘船只在中途遇了难。这份390年前没能送达中国的国书，其复本1986年10月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礼物送给了李先

念主席。17世纪初，英王詹姆斯一世又致书中国皇帝，表达通商贸易的意向。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翻译和呈送这份国书，因为按当时的刑律规定，这是要处死刑的。这样，英国虽然作过多次努力，却没能与中国建立直接的经商贸易关系。

英国人是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之后到达中国经商的。16世纪初，葡萄牙人首先到达中国。作为当时称霸海洋的殖民主义者，他们以惯用的海盗行径，对所到达的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抢劫和掠夺。屡次被中国军民驱逐出境后，他们改变手法，不断地向中国官员进行贿赂，逐渐获得了经营买卖、停泊船只、设点贸易等权益。1553年，又以每年缴纳租银1000两的代价，使明朝政府准许其在香山县澳门租地蓄存货物。从此，澳门就逐步成为葡萄牙实行殖民统治、各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第一个据点。接着，当时海上的另一个霸主——西班牙于1575年也挤进中国，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贸易，并于1626年公然派兵强占中国台湾北部的大部分地区。17世纪初，荷兰崛起，成为海上霸主，大力开展与东方的贸易。1601年，荷兰的第一艘船只到达中国，但没有达到通商目的。于是多次使用武力强行“贸易”，也先后受挫。荷兰殖民者就派兵攻占台湾南部，并且打败在北部的西班牙人，从1642年起在台湾实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直至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1637年，英国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经商贸易的尝试。在葡萄牙殖民总督的许可下，英国海军威得尔船长率领的4艘船只于当年6月25日到达澳门。由于澳门当局的阻挠，贸易毫无进展。威得尔即率船驶向广州。在虎门，他被告知进入广州需等待当局的允许，但他不听劝阻，无视一个国家的主权，率船闯进珠江口，并炮击虎门炮台。中国守军进行了还击，双方各有创伤。船只抵达广州后，售出了携带的货物，装上了中国的糖和姜，匆匆离

去。对于这一事件，中国当局认为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偶然事端，采取了宽恕的态度。这是中英间的第一次贸易，是英国人威得尔采取野蛮的武力手段达成的。此后，英国人在澳门、广州地区作过多次贸易尝试，都因葡萄牙人的作梗以及中国当局的阻拦刁难而未能顺利进行。有材料记载：1674年，英国派一艘贸易船去澳门，但“仅以极低的比价用物物交换的方法，卖出布匹十一件”就返回了。为能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一个席位，英国开始另找出路。167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与统治着台湾的郑氏政权订立了贸易协议，在台湾和厦门设馆通商。在郑成功的根据地厦门，英国人取得了比台湾更大的收益。到16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两地共投资了现金3万银元、货物2万银元，交换到中国的生丝、黄铜、大黄等。这一贸易大约维持十年之久。郑克爽投降清政府后，英国人重新开始了在厦门的贸易。

在18世纪以前，中英之间的交往虽不如中国与亚非各国那么友好、密切，但总的看还是平等的，互利的。18世纪以后，两国关系出现了转折。

愚昧狂妄 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

15世纪，中国正处在明代朱家王朝统治时期，仍是当时世界上先进和强盛的国家。从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朝廷宦官郑和曾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大规模的远航，先后到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的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繁荣和富强。但这个壮举并没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明史·郑和传》记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可

见，郑和七下西洋，花费国家大量财富，所负使命只是密切明帝与藩属的君臣关系，并为朝廷攫取珍奇财宝。

进入16世纪，中国渐趋衰落。特别是清帝国建立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极端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满族人享有特权，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者。他们与汉族大地主互相勾结，维持着封建专制的统治。他们骄奢淫逸、贪污搜括，残酷地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致农民纷纷起来反抗。在1795年至1840年的40余年中，大的农民起义就达十余次，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796年至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残酷的统治，疯狂的掠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也使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而17世纪以后，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倾销鸦片导致的国内大量白银外流，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经济。

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衰落，必然使武备废弛。清帝国号称拥有“八旗”、“绿营”百万，但武器落后，缺乏训练，兵老卒衰，纪律松散。平时将帅克扣粮饷，士兵到处抢劫，战时则闻风丧胆，不战而溃。

就在这个时候，西方殖民者和向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列强先后通过抢劫、屠杀等野蛮手段登上了中国土地。对于海外势力的侵入，清统治者有所警觉。1716年康熙帝在诏谕中说：“海外如西洋等，千万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于是规定：允许继续与东洋（日本等国）贸易，禁止与西洋人控制的吕宋（菲律宾等地）通商。这是针对西方殖民者的掠夺而采取的对外限制对策。随着西欧资本主义日益疯狂的对外扩张和掠夺，中国逐渐成为列强侵略的重要目标。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进行民族自卫，在18世纪中叶正式提出和形成了消极防范的锁国政策，即闭关自守政策。1757年，乾隆以“民俗易嚣，洋商

错处，必致滋事”为由，下令封禁了江苏云台山（连云港附近）、浙江宁波、福建漳州三个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地。为了加强对外国商人的管理，乾隆、嘉庆、道光分别发布《防范外夷规条》、《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三个规定。其主要内容有：外商禁止在广州过冬；在广州期间只准住在行商馆里，并受到行商管理，不得私带妇女入商馆；外商雇佣华人只限通事和买办；外商一律禁带枪支和其他武器；禁止在内河划船闲游，兵船停泊外洋不得进入虎门；外商的禀帖，必须由行商代为转呈等等。为了控制对外贸易，清政府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十三行行商由政府指定，受广州当局严格控制，除进行对外贸易外，还负责对外商的监视。国外评论说：公行“单独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保证对政府法令的服从，并作为政府与外商间联络的唯一中间人。”“它既有一个组织，又有相沿六十年不变的种种特权。它还赋有一些纯粹政府的权力，一方面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并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另一方面又作为官吏们想要从中大捞一笔财富的输导线。”当时，外商要在广州经商，首先必须在葡萄牙租借地——澳门办理证件，由澳门中国当局发牌准其雇佣通事和买办，然后进入黄埔。从外船进入黄埔直至船上装好回程货物的这段日子里，外商一切都得听从行商的安排，不然，公行的官吏职员会以种种理由终止贸易。为此，外商只能一方面唯命是从，另一方面为尽快办妥事情而不找麻烦，向官员们大肆行贿。得到贿赂的官员们即想方设法为外商开方便之门。这样，清政府制定的具有一定防范意义的闭关自守政策，由贪官污吏们来执行后，很快不攻自破、全线瓦解了。

把清政府的这些通商制度仅仅看作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承认它起了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布莱克斯利在《中国与远东》一书中叙述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沿海的

侵扰和掠夺，并写道：“如果中国政府不鉴于上述事例，对有关国家采取严格闭关政策，岂不表明它是无以复加的无能，可耻地不顾臣民生命财产么？”同时也必须承认，“在国内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任务的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把对外的自卫政策认真地贯彻下去，更不可能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因此，清王朝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它企图使中国人、中国社会与世隔绝，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

清王朝一贯无视西方社会的进步，一概排斥西方的文明。王爷们甘居落后，却又狂妄自大。乾隆皇帝于1793年在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难怪乎外国人对此评论说：“中国一向自认为是天府之国，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足自给，中国同任何外国的贸易，绝不承认是互利，而只认为是对外国的特别恩赐。”乾隆之后的嘉庆帝，在1797年的一篇上谕中也说：“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查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这里讲的是钟表，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的先进技术，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死死抱住陈旧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就是这个闭关自守、盲目排斥外来一切的“国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就是这个闭关自守的“国策”的执行，使得列强们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手段打破中国的自我封锁。

贪婪狡诈 向外扩张的“日不落”帝国

15世纪，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这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制度内部迅速发展。从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美洲大陆的发现，欧印新航线的开辟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也迅速增加。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虽然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竭力反抗，但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激烈的斗争，几经反复，终于在17世纪下半叶推翻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国取得了统治地位。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为英国产业革命开创了有利条件。机器的发明，蒸汽机的问世以及火车、远洋轮等新运输技术的运用，使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成为机器大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工业发展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的迅速发展。到19世纪，英国进入全盛时期，它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场”之称。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对外关系上推行着征服它国民族、掠夺殖民地的政策。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就开始加紧同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它首先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打败了当时有“全球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夺得了海上霸权。接着，它与法国进行了激烈争夺。18世纪争得了对控制欧洲有战略意义的地中海要地，夺取了北美殖民地；1763年又从法国人手中得到整个加拿大和印度的大部分。19世纪，英国与俄国进行较量，挫败了俄国，控制了土耳其，巩固和扩大了在巴尔干和西亚的势力，英国海军可以自由地进出黑海。这样，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血腥角逐中独占鳌头。乘此“东风”，它大

肆扩张殖民地。在非洲，它首先控制整个北非和红海，接着占领南非，又夺得了东非和西非，在广大的非洲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在亚洲，也不断地扩大它的占领范围，从部分占领印度，进而使全印度沦为殖民地。这样，英国拥有的殖民地遍及世界五大洲，每天的个小时内，总有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在阳光照耀之下。英国得意地自称为“日不落帝国”。

对地处亚洲东部的中国市场，英国早就期望开辟，并为此作过多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应该看到的事实是，中英之间的贸易一直在持续增长，发展还是迅速的。在1736年到广州进行贸易的12艘外国商船中，英国占5艘；而在1775年的38艘船中，英国就占24艘。18世纪初，中英贸易额每年约白银50万两左右，到18世纪末叶，达1000万两以上，占中国当时对欧美各国海上贸易额的80%左右。但是，资产阶级是贪婪的，它并不满足于这种贸易交往。特别是英国在产业革命以后，生产飞速发展，商品量急剧增长，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迫切要求打开中国市场大门。但他们遇到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吃了闭门羹。为此，英国商人们逼迫代表着自己利益的英政府出面干预，要求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对华贸易，推行殖民掠夺政策。

英国政府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作了各方面努力，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789年，英国曾派遣卡斯卡特勋爵作为特使，到中国交涉两国发展通商贸易问题，由于使臣途中病故，未能到达中国。接着，英国于1793年又派马戛尔尼伯爵率领庞大使团到中国。对于这次出使，英国极其重视，作了精心安排，选择了曾担任过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印度省长并有高官爵的马戛尔尼任正使，斯当东男爵为副使，携带大批随行人员，包括步兵、炮兵卫队、工程技术人员、工匠、医师以及其他随从百余。乘坐的船只是装64门大炮的军舰“狮子”号，还准备了大量赠送给中